

《中国教育科学》编辑部 编

中国教育科学

Education Sciences in China

2016年
第**3**辑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科学

ZHONGGUO JIAOYU KEXUE

2016年
第3辑

《中国教育科学》编辑部 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科学. 2016 年. 第 3 辑/《中国教育科学》编辑部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107-26584-6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教育科学—中国—文集
IV. ①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5154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张: 12.75 字数: 275 千字

定价: 30.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电话: 010-58759215 电子邮箱: yzzlfk@pep.com.cn

2013年创办 每年四辑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会刊

封面题字

顾明远

主 编

郭 戈

副主编

刘立德

石筠波

编辑部主任

韩华球

执行编辑

李 冰

封面设计

于 艳

联系电话

010-58758980

010-58758508

传真

010-58758991

投稿地址

<http://bkstg.pep.com.cn>

邮编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

1号楼

比较教育

顾明远 我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3

刘宝存 中国比较教育的制度化:历程、挑战与变革/15
张 伟

教育专论

叶 澜 终身教育视界: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聚通与提升/41

学术感悟

谢维和 做教育真难
——我的治学历程与学术感悟/69

教育改革

胡定荣 学校改进:认识边界、历史逻辑与前进方向/91

陈瑞生 论学校精神的内涵/121

教育科研

褚远辉 2000年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回顾与展望/141

教育学史

侯怀银 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系科变迁研究/159
李艳丽

回顾大家

熊贤君 孙中山教育思想简论
吴 丹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177

教育书评

刘 捷 守正出新,久久为功
——《比较教育》(第五版)评介/192

2013年创办 每年四辑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会刊

封面题字

顾明远

主 编

郭 戈

副主编

刘立德

石筠波

编辑部主任

韩华球

执行编辑

李 冰

封面设计

于 艳

联系电话

010-58758980

010-58758508

传真

010-58758991

投稿地址

<http://bkstg.pep.com.cn>

邮编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

1号楼

比较教育

顾明远 我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3

刘宝存 中国比较教育的制度化:历程、挑战与变革/15
张 伟

教育专论

叶 澜 终身教育视界: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聚通与提升/41

学术感悟

谢维和 做教育真难
——我的治学历程与学术感悟/69

教育改革

胡定荣 学校改进:认识边界、历史逻辑与前进方向/91

陈瑞生 论学校精神的内涵/121

教育科研

褚远辉 2000年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科研的回顾与展望/141

教育学史

侯怀银 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系科变迁研究/159
李艳丽

回顾大家

熊贤君 孙中山教育思想简论
吴 丹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177

教育书评

刘 捷 守正出新,久久为功
——《比较教育》(第五版)评介/192



顾明远 1929年生，江苏江阴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育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副主席。荣获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人民教师”等称号。香港教育学院、澳门大学、日本创价大学名誉博士、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名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教育、教育哲学、基础教育等，出版专著3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培养中外硕士、博士60余名。许多著作对中国教育理论和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也获得了多项奖励。

《我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导读

- 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外国教育研究室和出版《外国教育动态》
 - 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立
 - 比较教育研究会的成立
 - 比较教育学科教材和系列著作的编著出版
 - 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
 - 比较教育学科危机和比较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

我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

顾明远

【摘要】 我与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立、比较教育研究会的成立、比较教育学科教材和系列著作的编著出版,以及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活动等过程中,我都发挥了一些作用。本文回顾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对目前我国比较教育学科面临的危机和比较教育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分析及展望。

【关键词】 顾明远; 比较教育; 学科建设

2016年8月,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终于要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教育科学》辑刊要我讲讲我与比较教育的故事。我就从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说起。

可以说,中国比较教育经过了坎坷的历程。自从西方教育制度传入中国以后,教育界就有许多学者研究西方教育,有的到欧美、日本留学,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掀起了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如《新青年》、《新教育》等许多杂志都介绍西方教育情况。1919—1921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和孟禄先后被邀来华讲学,他们的演讲都被汇编成书在中国出版并广为流行。但那时没有建立起比较教育的研究体系。

大家都知道,最早出现的比较教育教材是1927年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教育研究所所长庄泽宣教授主编的《各国教育比较论》,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厦门大学教育学院钟鲁斋教授编写了《比较教育》;再有是常导之教授于1936年编写的《各国教育制度》等书。^①这一时期,仅此屈指可数的几本大学教育专业的教材和著作出版,比较教育学科已经出现,但学科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学习苏联,国家采取相对封闭的政策,认为比较教育是宣扬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因此,在大学教育系取消了这门课程,更谈不上比较教育学科建设。

^① 王承绪主编:《比较教育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299页。

在中国真正把比较教育在教育学科群中建设成一门分支学科还是在20世纪后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与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缘分。这要从创办《外国教育动态》的工作开始讲这段中国故事。

一、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外国教育研究室和出版《外国教育动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学习苏联。北京师范大学于1951年就请了苏联专家来讲学。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编辑出版《教育译报》,主要译介苏联教育文献和教育研究成果,我是这个杂志的作者。为了给苏联专家配备翻译并翻译出版苏联教育著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成立了教育编译室。

196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同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就在教育编译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把懂得外语的一批老教授和中青年调到外国教育研究室工作。我因为留学苏联,所以也在被调之列。此外,北京师范大学还成立了苏联哲学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美国经济研究室。后来四室合并成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所,学校党委副书记谢芳春任所长,我任副所长。当时研究所的工作非常神秘,任务是为了反帝反修,知己知彼,研究所只设邮政代号,不对外公开。

为了把收集的外国教育的资料供领导参考,中央宣传部提出要办一份教育杂志,叫《外国教育动态》,供地委以上的干部作内部参阅。校党委书记程今吾就把这个任务接了过来交给教育系筹办。但是这个任务怎么落到我的头上的呢?说来也巧,1964年秋天,大家都在忙着下乡搞“四清”运动。下乡之前要体检。体检时发现我有肺炎,需留下休息。当时教育系系主任于若琳同志就说,你干脆留下来筹备《外国教育动态》杂志吧。于是我就和比较教育结上了不解之缘。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于1965年春出版了第一期试刊,到1966年“文革”之前共出试刊2期、正刊3期。关于《外国教育动态》的办刊宗旨,在试刊第一期的发刊词中有如下一段说明:“《外国教育动态》是供教育工作者在教育领域内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外国教育批判研究作参考的内部刊物。它的内容将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著作、兄弟国家的教育经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民族独立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情况;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施,以及资本主义各国的教育动态和帝国主义的教育政策。”选编的每篇文章前面都由我写编者按语或说明,以表示我们的立场,并送中央宣传部教育处审阅。即使如此,“文革”一开始它还是被扣上散布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思想阵地的帽子而被迫停刊。外国教育研究室也被迫停止工作,我也被批斗。

1973年,外国教育研究室开始局部恢复工作,《外国教育动态》作为内部资料又

开始编印,至1979年共出刊22期。但这段时间已不是由我负责。因为我1971—1972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1974年被“解放”到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工作,1975年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组”副组长兼文科组组长。

直到1979年我回到教育系任主任并兼任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才又回到我的专业岗位。我努力想促使《外国教育动态》正式复刊。于是我冒昧地给当时国务院主管科教方毅副总理写信,说明《外国教育动态》的来历,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界了解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迫切性,希望《外国教育动态》能早日复刊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没有想到,这封信很快得到方毅同志的批复,同意杂志复刊并成为正式刊物向国内外发行。于是《外国教育动态》1980年就正式复刊并公开发行了,1993年在比较教育界同人的爱护下,作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现名比较教育分会)的会刊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不久它就成为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刊物直接催动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该刊为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和众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提供了研究成果发表的平台。当代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骨干,无一不与这一刊物有关。

二、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立

1979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我担任第一任所长,并兼任教育系系主任。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和国外交往。最早来访问的是日本广岛大学大学教育研究中心代表团,由我们外国教育研究所接待。1980年3月,教育部邀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比较教育学专家、美籍华人胡昌度教授来我校教育系讲学一个学期,同时组织了一个高等学校比较教育教师进修班,有部属6所师大和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学院(现福建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现哈尔滨师范大学)等10所高等学校十多位教师参加。我作为教育系系主任和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负责组织这个进修班,并与本科生和进修班教师同堂听课。

进修班结束时,我们十多名教师凑在一起商量我国比较教育学科重建的问题,一致认为,教育系要开设比较教育课程,为此首先要编写一本教科书,供教育系本科生学习。在当时教育部高教司的支持下,我们就着手研讨编写。为了保证质量,我们请老一辈比较教育学者王承绪、朱勃、檀仁梅教授来指导。后来檀仁梅教授因病未能参加。经过两年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比较教育》全国通用教材终于在1982年问世。该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后几经修改,都由我主持,2015年已出版发行第五版。可惜朱勃教授、王承绪教授都相继离世,未能见到最新的版本。《比较教育》这本教材多次获得科研奖、优秀教材奖,至今仍是师范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基本

教材。

比较教育成为一门学科的主要标志是,1980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立,在学位专业目录中,教育学是十大门类之一,比较教育被列为教育学中的二级学科,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了硕士学位授权点。1983年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和杭州大学设立博士学位授权点。我与王承绪教授被确定为第一批比较教育博士研究生导师,从此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88年王英杰获得我国第一个比较教育博士学位,之后多所师范大学获得比较教育硕士、博士授权,比较教育一时成为我国教育学科中的显学,比较教育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至今获得比较教育博士学位的已达数百人。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1998年后先后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一方面着力于学科建设,另一方面重视为决策部门提供外国教育的信息和资料,提供咨询意见,同时还向广大教育工作者介绍外国教育思想和经验。我们为我国的学位建设和研究生教育提供了大量资料,为师范教育会议的召开和教师节的设立提供了许多外国教育参考资料。

“六五”期间,我们除了承担“战后苏联教育研究”国家重点课题外,还编写了《比较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比较》、《师范教育比较》等专著;介绍了赞科夫、苏霍姆林斯基、布鲁纳等人的教育思想,翻译出版了他们的专著。其中,《比较高等教育》曾获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及其他多项奖项,《战后苏联教育研究》获国家教委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八五”期间,我们开始关注周边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研究,由王英杰教授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由我承担了国家重点课题“民族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工作。1998年《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出版,此书获1999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我和我的博士研究生薛理银合著的《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获2001年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经过研究所全体成员多年的努力,我们的成绩被社会所承认。1988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第一批重点学科,并被列为全国重点资助的12个研究所之一,2000年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年再一次被评为全国重点学科。

三、比较教育研究会的成立

比较教育学科建立的另一个标志是,比较教育研究会的成立。1978年7月5—15日,全国第一届外国教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师范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五所高等学校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的约 50 名代表参加。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出席会议并讲话。

1979 年 10 月底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外国教育学术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承办。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五所院校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外，又增加了中央教科所、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他几所师范院校的代表共 90 余人。会上酝酿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会，隶属于中国教育学会，由刘佛年担任理事长。1981 年在保定召开第三次外国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由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承办。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天恩任理事长。1983 年在长春召开第四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研究会名称就改为比较教育研究会了。会议由东北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承办。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会换届，由我担任理事长，这一干就是 19 年，直到 2002 年第十一次年会才卸任。

在历届年会中值得一提的是第六次年会，于 1990 年在天津召开。在这次会上我做了“比较教育的回顾与瞻望”的发言，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成绩和问题，阐明了今后发展的方向。

此后，比较教育研究不再单纯地介绍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开始进入比较研究的阶段。第七次年会 1993 年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承办。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外国教育动态》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并作为比较教育研究会的会刊。

此后，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地方，如黑龙江、广东、陕西等省都先后成立了省一级的比较教育学会。

四、比较教育学科教材和系列著作的编著出版

比较教育研究会成立和学位研究生教育开展以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前面已经提到，第一本《比较教育》是于 1982 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85 年经修订出版发行了第二版，内容增加了第十章“回顾与瞻望”。当初编写第一版时，因为我国“文革”刚结束，教育制度正在恢复中，所以第一、二版都没有撰写中国教育制度，没有把它放在专题比较中。1999 年出版发行的第三版就增加中国教育制度一节，并在专题中进行了比较。2012 年又出版发行了第四版，这次修订吸收了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全书重新撰写，增加了许多新内容，篇幅也有较大增加；作者增加了一批成长起来的中青年骨干。2015 年作为“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又出版发行了第五版。30 多年来这本教材随着教育科学的发展和各国教育改革的进展，不断修订，不断为读者提供比较教育

前沿的理论。不仅师范院校的本科生将其作为基本教材,而且许多教师也把它作为了解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读本。

在比较教育界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版的《外国教育丛书》(共34卷)、90年代初由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编译的《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共5卷)和21世纪初的《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共9卷)。它们都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近40年来,涌现了许多专门的比较教育学术成果。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我共同策划了四套大型丛书,都由我担任丛书主编,作者都是比较教育界的著名学者或年轻骨干。

第一套丛书是《比较教育丛书》,共10卷,包括:《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顾明远、薛理银著),《比较教育学史》(王承绪主编),《比较教学论》(吴文侃主编),《各国教育法制的比较研究》(郝维谦、李连宁主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王英杰、曲恒昌、李家永著),《中等教育考试制度比较研究》(韩家勋、孙玲主编),《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一个世界性的课题》(陈列著),《理想与抉择——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国际比较》(张民选著),《国际师范教育改革比较研究》(陈永明主编),《国际环境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徐辉、祝怀新著)。

第二套丛书是《比较教育论丛》,共10卷,包括:《中小学公民素质教育国际比较》(吴文侃主编),《义务教育投资国际比较》(高如峰主编),《世界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周满生主编),《美国社区学院的改革和发展》(万秀兰著),《走向新纪元的港澳台教育》(冯增俊著),《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弗莱雷解放教育理论与实践》(黄志成著),《中美加英四国基础教育研究》(强海燕著),《国际后期中等教育比较研究》(张德伟、梁忠义主编),《和而不同——比较教育的跨文化对话》(王长纯著),《共性与个性——国际高等教育改革比较研究》(邢克超著)。

第三套丛书是《比较教育译丛》,共13卷,包括:《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康德尔著),《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埃德蒙·金著),《比较教育概论》(加里多著),《世界教育危机》(库姆斯著),《走出教育改革的误区》(藤田英典著),《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和发展》(阿特巴赫著),《1945年以来的德国教育:概览与问题》(福尔著),《人力资源规划:方法、经验与实践》(贝尔特朗著),《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克拉克著),《高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约翰斯通著),《大学的持续变革:创业型大学新案例和新概念》(克拉克著),《全球化时代的教养与学力》(堀尾辉久著),《比较教育学: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阿诺夫等著)。

第四套丛书是《比较教育文库》,共10卷,包括:《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薛理银著),《当代西方教育新思潮研究》(朱旭东主编),《教育宏观决策比较研

究》(周满生等著),《教育考试评价制度比较研究》(韩家勋主编),《教师教育伙伴合作模式国际比较》(许明著),《比较教育学家思想研究》(李文英等著),《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关松林著),《世界教育领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与策略研究》(徐辉、武学超著),《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研究史》(王长纯、王建平主编),《教育督导评价制度比较研究》(王璐著)。

此外,人民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吴文侃、杨汉清主编的《比较教育学》,冯增俊、陈时见、项贤明主编的《当代比较教育学》,卢晓中撰著的《比较教育学》等。其他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等也都出版了许多比较教育方面的图书。这些教材和系列论著对于促进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吸取外国教育经验、展示我国比较教育界成果、扩大我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反映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建立、发展和学术繁荣。

五、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

1980年夏天,我应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平冢益德教授的邀请,与中央教科所金世柏和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苏真一起去日本埼玉县参加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第四次大会,在会议期间我们提出了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名义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申请。

1984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五次大会是由华东师范大学的马骥雄教授和河北大学刘文修教授参加的。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为该会的团体会员。

1987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第六届大会,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派出了金世柏、周南照、吴福生、孟宪德和我参加了大会。我被选举为该会的副主席。我们在这次会上正式提出举办下一届大会的申请。但执委会考虑到时间太仓促,决定第七届大会由加拿大举办,为了照顾中国的迫切要求,会期由三年缩短到两年,第七届提前到1989年举行,第八届大会在1991年由中国举办。

第七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如期于1989年7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周南照、詹瑞玲、吴福生、毕淑芝、王英杰和我,还有在北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等。当时正值国内刚发生了“六四”风波。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于是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委会上对下一届大会能不能在中国举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执委会上,我坚持说:“六四”风波的处理是中国的内政,而且当时已经恢复正常秩序;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应因政治问题而干扰学术活动,中国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办好大会。执委会中有少数与我们友好的专家如英国的埃德蒙·金、美国的梅斯曼以及当时苏联的委员马林可娃等支持我们

的意见,但大多数委员有的由于自身的偏见,有的由于不敢有违本国政府的政策而反对。最后执委会决定第八届大会由捷克斯洛伐克举办。但决议草案如何拟定,又展开了一场辩论。我坚决反对把“六四”事件写到协议中。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经过艰苦斗争,终于在决议中没有提“六四”事件,只提出“执委会鉴于广大学者对捷克斯洛伐克教育民主化进程感兴趣,下届大会在布拉格召开”,并议定第九届大会(1993年)在中国北京举行。

1990年7月,我和周南照去马德里参加欧洲比较教育学会年会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委会会议。在会上又一次对第九届大会能否在中国召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大多数执委都同意在中国北京召开。但是,本来应该谁家举办,谁家就担任联合会的主席。但一些执委仍然坚持让德国比较教育学家米特尔继续担任主席。在埃德蒙·金和梅斯曼等友好学者的支持下,由我担任合作主席,负责筹备1993年在北京举办第九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在这次执委会上吸收了“中国台湾比较教育学会”人会。

1991年7月在布拉格召开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参加的有周南照、吴福生、詹瑞玲和我四人。会议期间又商讨下届大会筹备的问题。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国教育部港澳台办提出“中国台湾比较教育学会”参加联合会的名称有问题,认为称为“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台北)”不妥,要求他们更改名称。台湾方面坚持不能更改,联合会执委会则推托认为这个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他们无权要求成员单位更改名称。几经交涉无果。我们只好采取既不退出,又不参加的策略。第九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也因此在北京流产。后来于1994年在悉尼召开。我们由此不再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一切活动,失去了许多与国外学者的交流的机会。特别对我来说,损失更大,我从此就再没有参加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但我们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我在名义上仍然担任着执委会委员,收到他们不断寄来的文件。同时,我利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这块阵地,不断邀请外国比较教育学者来华访问。英国埃德蒙·金就被我两次请来访问,我还请他参加了薛理银博士学位的答辩会议。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米特尔多次访华,后来继任的主席威尔逊、安娜·胡特逊等都来华参加过我们组织的国际会议。

1997年我与日本九州大学的权藤教授发起成立了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第一次年会在日本九州大学召开。我把第二次亚洲比较教育大会争取到在北京召开,1998年秋天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承办,会议的主题是“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到会代表200余人,外籍专家70余人,包括来自日本、韩国、印度、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伊朗和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几任主席和资深学者都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比较教育学

者 20 余人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可以算得上是一次世界比较教育的会议。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次大会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未能在我国举办第八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的遗憾。大会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2 年我校为庆祝校 100 周年举办了世界比较教育论坛。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主席安娜·胡特逊应邀参加了论坛并做了重要发言。联合会秘书长、后来继任主席的香港大学马克·贝磊教授更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的好朋友,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内地之间。其他世界著名比较教育学者也都与我国比较教育学者有着频繁的交往。

六、比较教育学科危机和比较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我作为一名比较教育的老兵,回顾几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千。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在我国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已经发展壮大。现在全国已有博士授权点 11 个,硕士授权点几十个,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出版了无数专著。但是,最近几年来在教育学术界出现一股“比较教育身份危机”的思潮,许多比较教育学者也表现出缺乏自信。他们的论据是比较教育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我在比较教育研究会广州年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什么叫学科?《辞海》和一般辞书中都是这样解释:“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一门学科首先要具有研究的对象或领域。比较教育具备这个条件。

我们可以从比较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看比较教育发展的前途。追溯一下历史,比较教育是怎样产生的?它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民族国家成立之初,教育普及之时。当欧洲民族国家成立以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国际市场,各国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人才,所以出现了像朱利安、库森等早期比较教育学者,研究别国的教育,借鉴别国的经验。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现借鉴别国的经验并不容易,需要对各国经验具体分析,所以出现了康德尔的历史分析法、萨得勒的因素分析法。二战以后的 20 世纪 60—70 年代是世界比较教育最活跃的年代。这个时期,两个阵营形成,“冷战”开始。特别是殖民地国家独立,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比较教育学者的眼光转向这些民族独立国家,企图用西方的教育制度来帮助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今天,关心不发达国家的教育,特别是这些国家中弱势群体的教育,仍然是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研究的重点。

前面讲到,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经过的坎坷的历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建立比较教育学科体系也是为了借鉴。几十年的闭关自守,使我国教育科技落后发达国家几十年,所以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的号召后,介绍外国教育的经验的比较教育就产生和发展起来。那个时候没

有人提出比较教育的学科危机，比较教育兴旺一时。比较教育介绍了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引进了国外的教育思潮，翻译出版了各种教育著作。近些年来情况不同了，教育工作者出国的机会多了，对外国的教育大家都知道一点了。过去教育部门有什么决策，如教育立法、建立研究生学位制度等都会来问问比较教育工作者，现在少了，比较教育工作者受到冷落了，再加上教育学科中任何分支学科都会做各国的比较，于是出现了比较教育学科危机。

从世界比较教育发展现状来看，除了极少数学者还躲在书斋里研究比较教育学科的方法论以外，大多数学者都走出书斋，研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如何落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理念，怎么能使世界上每一个儿童都得到应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满足他们最基本的学习需求。

就未来中国比较教育学科而言，我们不能空谈学科危机。我想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根据我国发展的形势和不断高涨的国际地位来转变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工作内容。我想有以下几方面的研究可以做。

第一，结合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任务，深入研究国际教育的新经验。我国教育正处在转变的时期，也就是要从注重发展转向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内涵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什么叫作教育现代化，有哪些指标？怎么形成学习型社会？什么才算人力资源强国？这都需要从国际视野中来研究，不能说我们自己说了就算数。

教育改革的核心是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对此，过去我们都有所研究，但不够深入系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深入研究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中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小学课程少、内容浅、教学松，他们怎么过渡到中学阶段、大学阶段的严格要求的？又如国外一流大学是怎么建立的？它与基础教育什么关系？为什么美国初等教育那样轻松，而出了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过去只看到零星的介绍，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需要深入一步，真正做到比较研究。

第二，深入研究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动向和趋势。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各国都在进行教育改革，提升软实力。许多国际组织也都十分关注教育问题，提出教育主张，影响各国教育的发展。比较教育工作者应该时时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关注国际教育发展的动向和趋势，切不可埋头于自己研究的小范围之内。没有国际的视野，很难有创意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都不断发表教育报告，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应该比较教育学科的责任。

第三，重视对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的研究。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

高，对国际的影响愈益增大，特别近几年来随着对“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的资本输出，中外文化教育交流日益频繁。比较教育工作者要转变视域，不要只局限于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要关注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

第四，进一步强化比较教育方法论的研究。学科建设、比较教育方法论等的学科理论研究当然仍然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点，需要借鉴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深入探讨。当代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都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教育也不例外。不能说比较教育因此就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瞻望未来，比较教育的发展仍需我们努力。创业唯艰，发展创新更难，年轻一代比较教育学者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 韩华球)